

育。问她关于抗日联军的事，她回答：不知道。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？她一下子提高声调作了义正词严的回答。与其说是回答我们的问话，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。激愤之情简直不象身负重伤的人，讲得有条有理，使人一听就懂，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，只有立即阻止她再往下讲。我断定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为了不让她在审讯中死去，决定给她医治。经过检查伤口，大夫摇摇头说：流血过多，非常衰弱，保证活命恐怕办不到。

在审讯中，我用了多种手法，甚至不顾她的伤势，施以残酷拷打，她没有改变态度。在痛楚中她既没有喊叫也没有缄默，她说：“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是不当的，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，是难于计数的！”什么样的审问方法对她都无效。我心里想，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，既然逮到了，总要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点破坏作用。我决定将她解到哈尔滨审讯。

在商议如何处置赵一曼时，我们认为如果能利用她，比杀几百个抗日军，效果还大。决定

给她医治，X光照片，她大腿骨碎了，二十四块碎骨散在肉里。大夫诊断，若把大腿骨锯掉，治疗时间要快些；如果不锯，也许脚伤会僵化，就极力主张锯掉。她本人坚决反对锯腿。后来，她竟然在监视她的警士和护士的援助下，从医院里逃跑了，在途中又被逮了回来。我们认为，对一个能组织起三万多群众的人，不应该把一个警士和护士留在她身边太久，这就是她能够逃走的原因。最后，她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的。

临刑前，宪兵队问她还有什么说的？她说：“告诉我那留在家乡的七岁的女儿，母亲为了抗日运动，不能留在她身边教育她，但是代替这个的，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她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。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，不要走错了路。”枪声响了，她倒了下去，她的态度从容，毫无惧色，令人震惊。

1983年11月版

忆郑佑之同志领导的“浪花社”

牟家河

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各地反动派公开屠杀革命人士，共产党员不得不由公开活动转为隐蔽斗争。郑佑之同志转入了地下活动，公开身份是宜宾县立一小教师。魏树卿任校长，黄思明也在该校任教。

民国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三月，郑佑之通过女中学生陈全林、刘德纯等联络女中同学，由我联络叙联中同学，组织浪花社活动。

浪花社名称是由郑佑之等人商订的，取义是掀起革命浪潮，要开放灿烂之花，目的是唤起青年，不要屈服在强暴势力之下，要在党的领导下联系广大群众，继续起来革命。浪花社的公开性质是一个文艺团体，实际上是团结一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。它每月油印出刊。读者是学生、青年。浪花社在宜宾城西城角陈如皋家里成立的。成立那天，参加的人较多（具体数字不清）由郑佑之同志主持并讲了

话。大意是青年学生必须起来革命，要革命必须联合工农群众；要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。当时，宜宾县大塔乡农民革命暴动正在酝酿，所以他号召了支援大塔农民暴动。

浪花社诞生后，积极开展工作，青年们思想很活跃，活动也很频繁。反动当局有所察觉，心里惶恐不安，立即行动。城防司令部伪参谋长沈眉荪，命令他们豢养的反革命鹰犬杨绍林（出名的杨胡子，特务谍查长）四处侦察，向进步的浪花社下毒手。

五月的一天，反革命沈眉荪下令查封了浪花社，同时查抄陈如皋的家，逮捕了陈全林等人，我亦被叫去侦讯（当时我在叙联中当文书）。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，把我软禁三个月后只得放了。反革命的猖狂屠杀一天紧似一天，郑佑之同志和一些革命同志只得秘密离开了宜宾城，走到乡里去另开辟革命据点。浪花社仅生存了三个月，就被反动派扼杀于血泊之中。

我为浪花社做的工作虽然不多，但我非常怀念浪花社。我感到浪花社从它诞生到结束，

虽然只有三个月，但是她是革命的，领导人是忠于马列主义的，参加的青年没有发现变节的。浪花社的一生是清清白白的啊！

1983年12月27日

历代名人咏宜宾

宣化道中

宋 范大成

瘦草蕭疏已似秋，
盤陀山骨束江流。
兩崖若不頑如鐵，
怎得狂瀾拍岸休？

注：宣化在今宜宾蕨溪乡，为宜宾古城。

白 沙 湾 党 訓 班

县政协委员李仲龄

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员的教育工作。蒋统区的地下组织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困难环境中，仍想方设法对党员进行培训。我记述的是千万次党训班中的一次。

一九三九年七月，我经舒厚钦同志介绍，在宜宾城内参加中国共产党。主持宣誓人老黄同志（即黄觉庵，当时是宜宾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长）。入党后，组织关系转到喜捷区委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，我从成都协进中学回家，不几天，厚钦同志（当时的区委书记）通知我，说组织上决定我去参加党训班学习，携带行李，先去城内上北街君乐茶园，等他一同去。学习地点在哪里，事先不知道，亦不能知道。

入学那天（记不起准确日期了），我两人带着行李去麻铺街一家麻布店里找到侯润白同志，由他领我两人到合江门码头，坐开往白沙